

人文经济的逻辑回归：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阐释与生产跃迁

车学森^{1,2}

¹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²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澳门

收稿日期：2026年5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30日

摘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物本主义范式的长期主导，引致现代生产体系劳动异化加剧、人文价值式微的深层困境。现有研究多将人文经济窄化为伦理层面的价值倡导，缺乏对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根基的深度挖掘，也未能厘清人文经济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学理关联。本文秉持纯思辨研究路径，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原初语境，系统诠释劳动价值论核心范畴的人文内核，勘定人文经济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理同构性，从价值本体、分析框架、终极目标三个维度阐释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推演人文经济逻辑下生产体系的整体性演化路径。研究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人文经济得以立基的核心理论基石，人文经济是劳动价值论人文内核在当代的实践彰显，其逻辑回归为破解物本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

关键词

人文经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异化劳动，人的全面发展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of Humanistic Economy: 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and Production Transi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Xuesen Che^{1,2}

¹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²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SAR

Received: May 8, 2026; accepted: June 22,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文章引用：车学森. 人文经济的逻辑回归：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阐释与生产跃迁[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6): 780-789. DOI: 10.12677/ass.2026.156533

Abstract

The long-term dominance of the material-oriented paradigm in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has led to the deep-seated dilemma of intensified labor alienation and declining humanistic value in the modern production system.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narrow humanistic economy into ethical value advocacy, lacking in-depth excav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failing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academic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istic economy and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dhering to the purely specul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Marx's classical texts,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the core categories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dentifies the theoretical isomorphism between humanistic economy and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explain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 ontolog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ultimate goal, and deduces the overall evolution path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under the logic of humanistic econom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is the cor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y, and humanistic economy is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humanistic core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ts logical return provides a systematic Marxist theoretical scheme for breaking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material-oriented econom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Duality of Labor, Alienated Lab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文经济的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根本遵循，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物本主义的范式框架，将人文价值、文化底蕴、人的发展嵌入经济运行全链条，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双向赋能、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同频共振，最终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

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的全新阶段，生产效率的提升与人文价值的缺失形成鲜明的二元悖论。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智能生产与平台经济不断重塑社会生产的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资本增殖逻辑借助技术工具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链条渗透，雇佣劳动的异化形态从传统生产场域延伸至个体生活的全部空间，劳动的主体性在算法管控中被持续弱化，劳动力再生产的人文需求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中被长期悬置。西方主流经济学构建的理论体系，始终以要素配置与效率最优为核心命题，将经济运行规约为纯粹的技术性过程，剥离经济活动内嵌的社会生产关系规定性与人的主体向度，无法回应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文价值缺失的深层矛盾，也难以形成破解劳动异化困境的有效理论方案。

从学界界定来看，人文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始终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终极目的[1]。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的要义是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人的因素，必须将人的幸福与发展纳入经济分析的核心框架，不能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2]。进入新时代，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国内学者围绕人文经济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展开

多维度探讨,形成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出发,阐释人文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关联,明确人文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3]。有学者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对人文经济的运行逻辑与政策导向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人文经济的实践落地提供学理支撑[4]。还有学者从城市发展与文化产业融合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人文经济的内涵边界,认为人文经济的本质是将人文精神融入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既通过经济发展繁荣人文事业,也以人文底蕴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城市发展中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矛盾的重要路径[5]。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发展的角度深化对人文经济相关命题的研究,推动人文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6]。

现有研究为人文经济的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学理短板。多数研究聚焦于伦理层面与价值层面的定性探讨,侧重人文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对人文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根基挖掘不够深入,弱化了理论的学术深度与现实解释力。事实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基础,从诞生之初便始终围绕人的劳动展开理论建构,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揭示商品生产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异化现象,将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理论的终极价值指向。马克思围绕价值源泉、价值构成、价值实现、价值分配的系列论述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为人文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与分析框架。

2. 物本经济的范式困境与人文经济的理论出场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物本范式与内在矛盾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历程,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学者初步确立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将劳动视为财富创造的源泉[7][8]。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始终局限于商品交换价值的表层分析未能深入挖掘劳动背后的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规定,最终在理论发展中陷入难以突破的逻辑困境。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革命为标志,彻底摒弃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逻辑,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构建以要素稀缺性、边际效用、市场均衡为核心的分析体系,将经济活动简化为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把人等同于普通生产要素,彻底剥离经济活动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属性,形成根深蒂固的物本主义分析范式。

物本主义范式的特征是将资本增殖与经济增长设定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将人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性要素。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经济学研究的命题转变为如何通过要素的最优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人的价值实现等命题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外。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将市场主体抽象为同质化的理性经济人,完全忽视个体的差异性、社会性与人文性,将经济运行简化为纯粹的数理模型,最终形成与现实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理论闭环。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展开批判,指出物本逻辑主导下,人自身的活动、人自身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变成了借助与人相异的自发性运行的东西[9],揭示了物本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根本缺陷。

物本主义范式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以剩余价值的攫取为导向,劳动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不断加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劳动从人的类本质活动转变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纯粹谋生手段。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与算法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灵活就业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并未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反而使劳动异化呈现出更隐蔽的特征。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表明,数字平台借助算法技术,将劳动过程延伸至个体的全部生活时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的边界彻底模糊,劳动力再生产的人文成本被完全转嫁,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趋深化[10]。哈特与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研究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非物质劳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渗透至个体的情感、认知、交往等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人的主体性被进一步消解[11]。

物本经济的深层矛盾本质是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对立是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必然结果。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忽视了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的背离，形成生产效率提升与人的发展滞后、物质财富增长与社会公平缺失的双重困境，这也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2.2. 人文经济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人文经济的理论价值体现在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固守的物本主义分析框架，重构经济学研究的人本向度，同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文内核的当代阐释，填补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的多重学理空白，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范式。

第一，人文经济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物本范式的理论纠偏与范式延展。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构建的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核心、以要素配置效率为唯一目标的分析体系，逐步将经济学异化为纯粹的数理技术科学，剥离了经济活动的社会属性、人文属性与人的主体向度。人文经济“以人为本”的逻辑理念重新确立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人的价值实现重新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框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将人等同于普通生产要素的理论偏执，纠正了效率至上的单一价值导向。其理论建构不仅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维度的长期忽视，更推动经济学研究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中心”的范式转型，回归了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的本质属性。

第二，人文经济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文向度的当代拓展与学理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初便将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但其人文内核在长期的理论传播与发展中多次被机械论、经济决定论的误读所遮蔽。现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多聚焦于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经济运行机制等客观维度的分析，对理论体系中内嵌的人文意蕴、价值指向的系统性阐释仍存在不足。人文经济以劳动的人本属性为逻辑起点，深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异化劳动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人文内核，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向度从隐性的价值预设转化为显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既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人文经济的内在学理关联，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当代经济发展新问题、新矛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创新与发展。

第三，人文经济为人文社科领域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长期存在学科壁垒，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技术化倾向，使其与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对话逐步割裂，也导致其对复杂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力持续弱化。人文经济的理论建构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分析壁垒，将经济活动还原为“人的社会活动”的本质，既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人的发展问题，也以人文社科的多元视角审视经济运行规律，实现了经济学工具理性与人文社科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从实践意义来看，人文经济立足于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对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困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为经济发展实践的转型与优化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导向与行动路径。

第一，人文经济为破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异化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实践方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新阶段，算法控制、平台垄断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趋隐蔽化、全面化，劳动异化从生产场域延伸至个体生活的全部空间，劳动的主体性被持续消解，劳动力再生产的人文需求被长期忽视。人文经济以劳动的人本属性为核心，明确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其核心实践导向便是破除资本逻辑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重塑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权益。人文经济既为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提供了价值遵循，也为优化劳动过程、消除劳动异化、推动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回归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为破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案。

第二，人文经济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人文经济强调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物质财富增长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的核心要求，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在实践层面，人文经济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实践命题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导向，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从“物的积累”向“人的发展”转型，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三，人文经济为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同质化竞争、附加值偏低、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传统产业发展中“重规模、轻内涵”“重效率、轻人文”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人文经济强调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推动实体经济与人文资源、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增长极。在实践层面，人文经济既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融入人文价值、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也催生了文化创意产业、非遗活化产业、体验经济等人文导向型新业态的发展，形成了“人文 + 产业”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内生动力。

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文意蕴

3.1. 劳动二重性：人文经济价值生成的本体论基础

劳动二重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更是人文经济价值生成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二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二者是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12]。这一理论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揭示了商品生产的本质，同时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意蕴。

具体劳动是特定形式、特定目的的有用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直接体现。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满足了人类多样化的生产生活需求，彰显了人的劳动的创造性与差异性，是人文价值形成的直接载体。具体劳动的多样性，对应着人类需求的丰富性，其过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更是人的技能、智慧、创造力的展现过程，蕴含着劳动的人文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的主体能力的对象化过程[13]，揭示了具体劳动的人文本质。

抽象劳动是撇开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耗费，其凝结形成商品的价值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抽象劳动范畴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价值的社会属性，更确立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唯一源泉地位，从根本上确立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否定了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错误观点，为人文经济坚持人本逻辑、凸显劳动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表明，抽象劳动范畴不仅揭示了商品价值的本质，更蕴含着对人的劳动的普遍性与平等性的肯定，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人文意蕴的重要体现[14]。

劳动二重性理论深刻表明，商品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与交换价值的创造过程，更是人文价值与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人文经济的价值创造并非脱离物质生产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统一的人类劳动过程，具体劳动承载人文价值，抽象劳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二者共同构成人文经济价值生成的理论基础。脱离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框架，人文经济就会沦为缺乏政治经济学根基的空洞伦理说教，丧失理论的科学性与学术性。

3.2. 异化劳动批判：人文经济的问题域与价值旨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物本生产逻辑的深刻批判，也明确了人文经济的核心问题域与价值旨归。异化劳动理论立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劳动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现实困境，其批判指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压制，这与人文经济破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15]。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异化劳动的本质是资本积累逻辑对人的发展逻辑的压制，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片面主导，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凌驾。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最终落脚点是消灭私有制、消除雇佣劳动的异化形态，实现劳动向人的本质活动的回归，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人文经济的终极价值目标。蔡万焕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异化的研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异化呈现出全新的表现形态，人文经济的建构必须以破解劳动异化困境为任务，这与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指向完全一致[16]。

异化劳动理论为人文经济提供了明确的问题导向，人文经济的核心任务就是破解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劳动异化困境，重塑劳动的人本属性，让劳动回归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质，让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同时，异化劳动理论也揭示了人文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只有摒弃资本至上的生产逻辑，优化社会生产关系，保障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文经济的发展目标。这也让人文经济摆脱了单纯的价值倡导，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批判力与理论针对性。

3.3. 劳动力商品理论：人文经济的劳动生产与人文关切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具体运用，蕴含着对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深层人文关怀，是人文经济关注劳动力再生产、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直接理论依据。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指出工人在市场上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基础。

劳动力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属性，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其内容不仅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劳动者繁育后代的生活资料，还包括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费用。这一论述突破了将劳动力视为普通生产要素的片面认知，明确了劳动力再生产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生存延续，更是精神层面、能力层面、发展层面的全面再生产，蕴含着对劳动者教育需求、发展需求、权益保障的人文关怀。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能够创造出超出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为人文经济理顺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保障劳动者价值分配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始终围绕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展开，明确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面性要求，这为人文经济的人文关怀提供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学规定。人文经济的核心人文关怀，聚焦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全过程，既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更要满足劳动者的发展性需求、精神性需求，实现劳动者能力的全面提升与价值的全面实现。这一理论为人文经济确立了以劳动者为核心的发展导向，让人文

经济的人文关怀具备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内涵。

3.4.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文经济价值实现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根本尺度，揭示了价值实现的社会属性，也阐明了人文经济价值实现的社会逻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打破了个体劳动的片面性，确立了价值的社会属性，表明商品价值的形成与实现，并非单纯的个体劳动过程，而是依赖于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平均劳动水平与社会需求。这一理论延伸至人文经济领域，表明人文价值的实现同样具有社会属性，人文经济的发展，并非个体层面的人文诉求满足，而是立足社会生产关系、契合社会发展需求、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的系统性过程。人文价值的衡量，不仅要考虑个体劳动的人文投入，更要契合社会整体的人文需求与发展导向。

同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也蕴含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思想，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的提升，本质是劳动者能力提升、劳动条件优化的结果，这与人文经济关注劳动者发展、优化劳动条件的导向相一致。顾海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当代发展的研究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的当代发展，不仅涉及物质生产领域，更延伸至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为人文经济背景下价值量的衡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7]。人文经济追求的效率，是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兼顾劳动者发展的效率，而非资本单方面的增殖效率，这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体现的社会整体劳动逻辑高度契合。

4. 人文经济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始终坚持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确立了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构建了以劳动为本位、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价值逻辑。人文经济彻底摒弃物本经济的资本本位逻辑，坚持以人的劳动为核心、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二者在价值逻辑上实现高度契合。劳动价值论从劳动本体论出发，否定了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的价值创造属性，将人置于价值创造的核心位置，强调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这为人文经济确立人本导向提供了根本理论支撑。人文经济强调人的价值实现、劳动价值尊重、劳动者权益保障，本质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劳动本位逻辑的继承与发展，是将劳动价值论的人本导向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二者均反对将人工具化、要素化的物本思维，均以实现劳动的人本属性回归、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形成了内在统一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生产活动的价值导向与运行逻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始终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价值分配关系等核心生产关系范畴展开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立的劳资关系，追求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人文经济的实践路径是重构物本经济下失衡的社会生产关系，理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优化价值分配关系，破除资本对劳动的压制，构建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完全契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生产关系优化的理论诉求。人文经济倡导的生产模式，不再是资本主导的剩余价值攫取模式，而是以劳动为核心、兼顾各方利益、符合社会整体发展需求的生产模式，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超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服务于人自身发展理论的当代实践。阿格里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化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阶段性缓解，无法从根本上破解[17]。人文经济要实现对物本经济的超越必须立足生产关系的优化，这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完全一致。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目标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批判异化劳动与资本剥削，最终实现消灭阶级剥削、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文内核所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在那个社会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8]。

人文经济作为对物本经济的超越，其终极发展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完全一致。人文经济反对经济发展的片面化、工具化，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与精神需求，实现人的能力提升、价值实现与全面发展，让经济增长回归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本质。可以说，人文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终极价值目标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彰显。

5. 人文经济逻辑下劳动生产的跃迁

5.1. 生产目的的演化：从资本增殖到人的发展需要的满足

生产目的是生产范式的核心规定性，决定了整个生产体系的运行逻辑与价值导向。资本主义物本经济体系中，生产的直接目的与终极目标始终围绕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最大化展开，生产活动完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商品，而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在这一逻辑主导下，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彻底沦为生产活动的附属品，生产与需要之间发生根本性颠倒：生产不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人的需要反而成为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消费被异化为资本循环的环节，而非人的发展的途径。这种生产目的与生产主体的背离，正是物本经济体系中劳动异化、生态危机、发展失衡等一系列深层矛盾的总根源。

人文经济的逻辑回归，首先推动生产目的发生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彻底摒弃资本至上的生产导向，将人的全面发展重新确立为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这一转换并非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生产终极目标的本质性颠覆：它打破了资本增殖对生产活动的绝对主导，将生产的根本目的还原为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人文经济视域下，劳动生产活动的核心使命，是满足人的多样化、多层次的真实需要，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生存与安全需求，更包括精神层面、发展层面、社会层面的人文需求；生产活动既实现物质财富的持续创造，更承载着人的能力提升、价值实现与社会关系优化的多重功能。生产活动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实过程，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一演化，回归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生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论断，实现了生产目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物本经济体系中生产与需要相背离的内在矛盾。

5.2. 要素配置的演化：从工具化规约到劳动主体性的彰显

生产要素的配置逻辑，是生产目的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体现，决定了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物本经济体系中，资本主导的要素配置逻辑呈现出鲜明的要素同质化特征。新古典经济学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所有生产要素，均还原为能够带来边际收益的同质化投入品，劳动被彻底剥离其人文属性与主体内涵，沦为与资本、土地无差别的工具性要素。在这一配置逻辑下，资本成为绝对主导性要素，其他所有要素均围绕资本增殖效率进行配置，劳动者彻底丧失生产过程的主导地位，沦为资本增殖的“活的工具”。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支配劳动的格局，在物本经济体系中被推向极致，劳动的主体性被完全消解，要素配置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单一目标，人的发展需求被完全排除在要素配置的考量之外。

在人文经济导向下，生产要素配置逻辑发生结构性重构的核心是基于马克思“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论断，重新确立劳动在要素配置体系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实现从资本支配劳动到劳动主导要素配置的根本转向。在这一配置逻辑中，劳动要素不再是被动的、被支配的工具性投入，而是整个生产要素体系的核心与主导；资本、技术、土地、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从主导性的支配要素转变为服务于劳动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辅助性要素。要素配置的核心评价标准不再是资本增殖效率的单一维度，而是构建起是否有利于劳动者主体性彰显、是否有利于人文价值创造、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提升的多元尺度。具体而言，技术的应用不再以规训劳动和压榨绝对剩余价值为目标，而是以减轻劳动强度、优化劳动环境、释放劳动者创造性为核心导向；资本的功能定位，从生产过程的绝对主导者，转变为服务于劳动发展、实体经济升级的辅助性要素。要素配置逻辑的演化从生产过程的底层架构上打破了物本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格局，让劳动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为劳动者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底层支撑。

5.3. 生产关系的演化：从劳资对立到共生共享的关系优化

生产关系是生产范式的制度基础，其性质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同时决定了价值分配格局与劳动过程的治理模式。资本主义物本经济体系中，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对立性关系。在这一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报酬，二者形成根本的利益对立。生产过程的主导权完全归属于资本，剩余价值分配向资本单方面倾斜，劳动者只能获得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无法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对立性生产关系正是劳动异化的制度根源，也是物本经济体系中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制度性成因。

人文经济立足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逻辑，推动生产关系从资本主导的劳资对立，向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共生共享、协同发展方向系统性演化，核心是构建与人文经济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制度层面消解劳资对立的内在根源。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制度维度。其一，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多元化重构。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劳动者持股、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等多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发展，推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从根源上消解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制度基础。其二，价值分配体系的根本性优化。彻底摒弃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分配逻辑，构建以劳动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分配体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分享机制，保障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与收益分配相匹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其三，劳动过程治理的民主化转型。建立健全劳动者参与企业治理的制度机制，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决策、劳动过程管理、劳动规则制定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让劳动者重新掌握劳动过程的主导权，从制度层面消除劳动过程的异化。这种生产关系的系统性演化，并非对生产关系的局部修补，而是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根本性超越，契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构想，为人文经济生产范式的落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5.4. 产业形态的演化：从单一物质生产到人文价值融合的业态创新

产业形态是生产范式的具象化载体，其发展方向与内在特征，由生产目的、要素配置逻辑与生产关系的性质共同决定。物本经济体系下，产业形态呈现出鲜明的单一物质生产导向特征。产业发展的目标是最大化交换价值，产业评价的核心标准是规模扩张速度与利润增长水平，形成了“重规模、轻内涵”“重效率、轻人文”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这种产业形态不仅导致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产品附加值偏低、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等发展困境，更造成了两个根本性的人文缺失。一是生产过程中人文关怀的空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恶化劳动环境；二是产品供给中人文价值的缺失，产品生产仅关注基本使用价值的实现，忽视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与伦理属性，无法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人文需求。

人文经济导向下产业形态实现深度转型与系统性创新，核心是推动产业发展从单一物质生产向物质生产与人文生产相统一的转型，实现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与人文经济相适配的新型产业体系。其一，生产过程的人文化转型。在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的全链条融入人文理念与人文关怀，建立人性化的劳动管理制度，优化劳动生产环境，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空间，让劳动过程从异化的强制性苦役逐步转变为劳动者发挥创造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其二，产品供给的人文化升级。打破产品使用价值单一化的局限，在产品的设计、生产、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中，融入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伦理价值等人文要素，推动产品从功能性供给向“功能性 + 人文性综合供给”升级，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契合其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产品使用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内在统一。其三，产业体系的人文化重构。一方面推动文化创意、非遗活化、体验经济、人文康养等人文导向型新业态的培育壮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推动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人文化转型，实现实体经济与人文资源、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人文 + 产业”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最终实现产业发展、人文传承与人的发展的同频共振。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4GXJK048)。

参考文献

- [1] 王忠, 车学森. 人文经济学研究: 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2): 77-86.
- [2] 厉以宁. 人文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3] 张二震, 戴翔. 人文经济的创新性、超越性及其内在机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5, 62(5): 5-19.
- [4] 洪银兴, 任保平. 人文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文经济发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6, 63(1): 5-12.
- [5] 王忠, 李小霞. 基于人文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2): 38-46.
- [6] 王国坛, 郭宇潮. 马克思劳动思想的人文意蕴[J]. 浙江学刊, 2024(6): 166-175.
- [7]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8]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0]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11] 哈特, 奈格里. 帝国[M].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1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候畅.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劳动价值论探究[J]. 劳动哲学研究, 2024(2): 52-64.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6] 徐一超, 单世联. 论数字时代人文经济的叙事之维[J]. 社会科学研究, 2026(2): 21-31.
- [17] 阿格里塔. 资本主义调节理论[M]. 谢富胜,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8]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